

兰州，远在西北内陆何以成为日寇“眼中钉”，遭日空军狂轰滥炸。这里，有比“飞虎队”更早的援华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碧血染长空。

本报记者任卫东、张钦

立秋刚过，黄河岸边绿意正浓。兰州市邓家花园里，葱茏的树木掩映着一座建于81年前的合葬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频繁空袭兰州，我军奋起抵抗。著名爱国将领邓宝珊的妻子崔锦琴，将邓家花园无偿借给空军第四路司令部作为驻地。1941年6月22日，在日军的一次轰炸中，崔锦琴带着3个未成年子女躲避空袭，却因“壕洞塌蔽”遇难。之后，她和孩子们归葬自家院中。

一杯黄土，难掩家国往事。

85年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远在西北内陆的兰州就遭遇日机轰炸。此后几年里，为保卫兰州和古丝路上的西北交通线，壮士碧血染长空，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

血泪记忆不能忘

抗日战争期间，大西北是抵御日军陆上入侵的大后方，也是空中反侵略的第一线。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袁志学长期研究兰州空战。他说，1937年8月14日，中日第一次空战在淞沪会战中打响。同年11月5日，日军就派出7架轰炸机突袭兰州，首次空袭就直扑兰州城郊的军用机场。

此后几年，兰州空警警报不断拉响。据《兰州通史》记载，1937年11月至1941年8月，兰州共遭遇日军空袭36次，日军共出动飞机676架次，投弹2738枚。

兰州远在西北内陆，何以成为日军“眼中钉”？甘肃省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孙瑛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为取得外国援华物资，在西北打通陆运、空运和通讯三条国际交通线。兰州及甘肃古丝路沿线地区发挥了交通枢纽和战略支撑作用。

正因如此，日军轰炸瞄准兰州，波及天水、平凉、陇西、靖远、武威、永昌等古丝路沿线的重点城镇，其轰炸频次和规模随外国援华物资的增多而增加。据地方志记载，日机最西到达河西走廊中段，并对永昌县城实施无差别轰炸。

无差别轰炸带给甘肃人民深重的苦难。据统计，甘肃省在空袭和轰炸中造成的直接人员伤亡1426人，损毁房屋24124间，无数民众无家可归，成为难民。

永昌县一位亲历者回忆，1939年日机轰炸永昌正值农历正月十七，县城正办庙会，轰炸后“地上、墙上、树上到处是肉屑、血迹和布片”。

2016年、2017年，靖远县居民两次发现日军轰炸遗留的未爆航弹。据《靖远县志》记载，日军对这个黄河上的重要渡口空袭11次，累计造成34人遇难，31人受伤。

《兰州市敌机轰炸人民死伤调查表》记载的遇难民众信息令人唏嘘：“易中兴，45岁，是一个卖水工，轰炸中在兰州市会馆巷23号被压死；老胡，60岁，是一个街头说书人，在会馆巷23号被压死；高尕女，年仅3岁，在中山林因避难所倒塌被压死；蒲丑丑，8岁，在山字石61号家中被压死……”

轰炸中，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兰州普照寺被燃烧弹击中，藏经楼及大量珍稀经卷被烧毁。据《兰州通史》记载，普照寺遭到4次轰炸，最后仅存一口金代铁钟。

“兰州虽故称边陲，四年之间敌机已数十至，伤我民庶，毁我室庐，暴戾坠突之行，实我民族所鉞心刻骨，永永不能忘记。”崔锦琴

兰州空战，不可磨灭的反法西斯战争记忆

的墓志铭写道。

空战碧血染长空

日军的狂轰滥炸非但没有炸垮古丝路上的西北交通线，反而激发了坚决的抵抗。据《兰州通史》记载，抗日战争期间，兰州地面防空部队只有一个营，但当1937年12月4日日军第二次空袭时，地面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就开火还击。此后，兰州上空经常爆发激烈空战。

袁志学说，抗日战争初期我国空军遭受重创后，兰州成为重建空军的重要基地之一，先后建起空军基地、训练基地、飞机修理基地。大量苏联援华的飞机也经由兰州飞往各地。

在历次空战中，1939年2月20日、23日的两次空战尤为振奋人心。据当时的甘肃地方媒体报道，敌机飞临兰州上空后，即遭遇我方军机的猛烈攻击。“我以旺盛之攻击精神，勇猛合击，战况空前激烈，敌机队形，即形紊乱”。两次战斗共击落日机15架。

《新华日报》发表评论说：“最近兰州空战，我空军一再告捷，更说明了我数量较少而英勇的空军，战斗力在日益增强中。”

兰州空战期间，反谍战同样惊心动魄。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邓明说，1939年，甘肃抓获并处决了搜集兰州情报的多名日本特务和汉奸。

据《兰州通史》记载，兰州空战中，共击落日军飞机47架，我方累计有63位军阵亡。

顽强反击之下，我方重要军事、交通目标得到有效保护。当时黄河上唯一的铁桥兰州黄河铁桥虽然弹痕累累，却一直车来车往。

袁志学说，兰州空战保障了西北交通线的安全畅通，使日本掌控西北地区制空权的阴谋成为泡影。

比“飞虎队”更早的援华志愿航空队

“空军烈士郭尔皆耶夫，生于一九一四年。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抵抗日本侵略者空战阵亡，殡葬于此。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是收录在《兰州古今碑刻》中的一则碑文。郭尔皆耶夫是在兰州空战中牺牲的一位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队员。

在有资料可查的63名兰州空战阵亡名单中，有9人来自苏联。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兰州空战中实际牺牲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队员远多于此，有些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据《兰州通史》记载，1937年10月22日，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首批人员到达兰州，后来陆续增加到100余人，约有飞机20架。

袁志学说，在当时驻守兰州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队员中，就有以后成为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的日加列夫。

据《甘肃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介绍，从首批援华志愿航空队到达兰州，至1941年苏德战争前后，有苏联军事顾问、专家过往人员3665人，轮流参战的援华志愿航空队员2000余人，先后组建8个航空兵群，共1235架次飞机飞临兰州。

孙瑛说，苏联援华力量有力地支撑了太原、武汉、南京、南昌、兰州等地的对日空战，200多名飞行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无暇西顾，西北的天空逐渐平静下来。然而，中苏勇士碧血染长空的事迹必将永载史册。

本报记者肖春飞、吴振东、潘旭

85年前的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历经重重苦难的上海，记录着日军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铭记着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全民族浴血抗战的历史。

大屠杀不限于南京

一个婴儿，在被日军轰炸后的断壁残垣中嚎啕大哭——这是淞沪会战中日寇暴行的铁证。

1937年8月28日，上海南站被日机轰炸，摄影记者王小亭闻讯后马上赶往现场，拍下了这张震撼人心的照片。

“彼时的上海南站位于上海老城厢的南市（现属黄浦区），远离战区，也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日军的轰炸完全是针对无辜平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说。纪念馆特意将这张照片制作成三维场景，照片中被轰炸后的废墟“延伸”至参观者的脚下。

当时的国际舆论，也在谴责日军的无差别攻击。1937年9月9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了9月8日由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列车，在上海松江遭到日机轰炸的场景：“客车五辆全毁，死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孺，受伤者更多，没有一个中国兵。上海难民又逢一次浩劫”，“轰炸以后，站内的景象至为凄惨，断腿残肢，血腥满地”。

唐磊说，事实上，日军的大屠杀，不是到了南京才开始的，也不仅限于南京一城，就在1937年8月13日当天，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已经开始。

日军挑起战端后，立即进占上海虹口、杨浦、闸北等地，封锁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根据8月15日《申报》报道，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居民，“以祸起仓促，未遑逃避”，“（日军）将此无辜居民，以刺刀大刀屠杀，而以吴淞路一带被日兵所杀死者尤多，以致尸体堆积，血流成河”。

10天后的8月23日凌晨，增援的侵华日军在上海宝山罗泾小川沙河口登陆后，沿途烧杀淫掠，在不到100天时间里，杀害平民2244人，占当时乡民总数的80%，烧毁房屋10948间，奸淫妇女数以百计，史称“罗泾血案”。

距离淞沪抗战纪念馆20公里的日军登陆点，如今已被修建为侵华日军罗泾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地，一块长22.44米的纪念碑寓意遇难同胞人数。纪念碑的几何形状墙体与地面融为一体，呈现出断壁残垣的形象，让人深感沧桑悲凉。

“罗泾血案”的少量幸存者如今依旧居住在这里。年过九旬的张家英对记者回忆说：“鬼子过来后，把老百姓都抓起来，用绳子捆起来，牵到东面的大坟，然后把房子都烧掉，32个乡亲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后来，逃难回来的人收尸，发现32个乡亲中最大的82岁，最小的只有6岁。”

另一名幸存者王佩英于2020年逝世。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说，当时，她亲眼看见日本兵到处杀人、放火，还目睹自己奶奶惨遭杀害。随后三个月里，她时而躲在废墟下的民房，时而躲在坟场，惊恐和饥饿让她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头发苍白，成了“白毛女”。

日军在其占领区为了进行大屠杀，每每先进行大搜查，凡遇青壮年男子，便抓去集中关押，集中屠杀，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1937年8月26日的《大公报》报道了8月25日的日军暴行：杨树浦平凉路同安里难民唐兆元等人“率领男女难民二百三四十名，拟往租界逃避”，当这批难民行经元昌路华美肥皂厂附近时，日军“将年青者百余名留下，坚不放行，立用机关枪扫射”。

据《兰州通史》记载，1937年10月22日，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首批人员到达兰州，后来陆续增加到100余人，约有飞机20架。

袁志学说，在当时驻守兰州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队员中，就有以后成为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的日加列夫。

唐磊说：“日机在配合其地面部队

85年前，椎心泣血的淞沪会战



▲1937年8月，一名摄影记者在当时的上海南站附近拍下的废墟中的婴儿。

进攻时，首先进行狂轰滥炸，将战区内的一切建筑物加以摧毁，使中国军队失去掩护之所。日军还有目的地对上海及周围地区的工厂、学校、房屋建筑及桥梁、道路等进行密集轰炸，就连手无寸铁的难民也不放过。”

上海地区的制空权几乎完全操纵于日军之手。《日军侵华战争》一书曾做过统计，从1937年8月13日会战爆发至9月下旬，日军用于上海战场的飞机已达200架。

日军侵华期间还设立慰安所。据统计，在上海的慰安所有172家，管理制度极其严酷，大批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历史学者估算，淞沪会战期间，上海死亡平民约10万至15万人。

淞沪抗战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把“侵华日军百人斩杀人屠刀”，这是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攻占南京途中进行杀人比赛使用的。1937年12月5日，侵华日军随军记者发出“杀人竞赛”新闻稿时，二人已各杀了89人和72人。5天之后，即12月10日，这两位刽子手已分别杀害了105名和106名中国人。此事被日本媒体所报道，成为日军侵华铁证。

上海民族工业遭遇毁灭性打击

“日商丰田纱厂唯恐中国申新纱厂在短期内恢复生产，派人至该厂，用重磅榔头将细纱车逐一敲坏，无一幸免……”淞沪抗战纪念馆内的史料，清晰记载了淞沪会战后日军对上海民族工业的疯狂破坏。

就在派人进入这家工厂前，日军已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1937年10月27日，日军占领上海闸北后，即派出飞机对申新纱厂进行轮番轰炸，投掷炸弹十八九枚，使厂房全毁，工人死伤400人。

20世纪30年代，工业的“齿轮”正带着上海飞速运转。到1937年6月底，上海共有工厂5515家。其中，棉纺厂数量约占全国76.7%，发电厂装机容量占全国总量45.5%。同时，上海建有区域间最大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证券交易市场；从上海港出发，可通达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

一个多月后打响的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这座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的发展轨迹，其经济在战火下遭受巨大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

“如果说，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成立所谓的‘满洲国’，其战略目的是制造一个战略大后方，进行物资、劳动力和兵员的储备，那么侵占上海就是为了掠夺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资源，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力图实现所谓的‘以战养战’。”唐磊说。

“南市30%的工厂被毁，闸北100%；日军侵占区内的商店计有12915家，受损失者达70%；已有30余万工人失业，成为一无所有的城市赤贫”……1937年10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2个月时，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初步调查后的数据。

1937年到1945年，基础薄弱的上海民族工业面临毁灭性打击，企业经营者举步维艰，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分析说，8年间，上海社会经济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淞沪会战时期。持续三个月的激战，使上海工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作被打断，进入较为典型的战时经济阶段，相当部分工业企业撤出上海，辗转西迁到大后方地区。二是从1937年

11月至1941年12月的孤岛时期。日伪经济和金融势力渗透进上海租界，中日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有所较量，而在日军占领下的华界，社会经济属于殖民地性质，日军可随意征用经济资源，日资企业在各方面凌驾于华商企业之上。三是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的沦陷时期。这一时期整个上海均为日军占领，日伪统治下，上海商业体制和物流渠道紊乱，原有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被强制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市民生活无以为继。

对民族工业，日军实行多种形式的掠夺。造船工业、机器工业等具有直接军事意义的工业企业，将其变为军用生产基地；其余工业企业则以“经济提携”名义，通过“委任经营”“租赁”“收买”等方式予取予夺，“委任”之下，华资业主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受托的日资企业不但对工厂有经营管理全权，全部利润也归其所有。

对市井生活，日军实行全面统制，导致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米粮消费市场和米粮集散地的上海，时常面临米荒。1941年12月，日军发布“办法”，规定上海不论个人、公司、团体等，对五金等5类物资，凡存量超过1000元以上，都必须向设在外滩24号的日领事馆申报，且“日本军于所申报之物资一部分，当可依据国际法条，以最适当之办法处理之”。

一边是直接打击和没收，另一边是另立名义掠夺财富。侵华期间，日军在上海大规模发行军票，充当其主要经费来源。军票一无发行准备，二无银行，三不用政府任何资金，仅承担印刷和运输费用。“三无”特征，充分暴露了经济侵略性和掠夺性。”据吴景平等学者研究，军票流通时间长达6年4个月，掠夺区域遍及华东和华南。

史料显示，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上海物价共上涨了5490倍。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除军票外，还有更为无耻的行径——发行假钞。据统计，日军侵华期间发行假钞总额，相当于当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初期2至3年的军费总和。

交通银行博物馆馆长杨德钧说，这些假钞通过在上海租界购物、在租界出售以及在赌场混用等方式流入市场，扰乱中国经济，培养收买亲日分子，帮助扶持汪伪政权，同时为日军购买军需和战略物资，支付日本士兵的生活费。

对上海文化的疯狂摧残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摧毁中国之文脉，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

侵华日军带来的，不仅仅是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还有对上海文化的疯狂摧残。

大夏大学创办于1924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校名取自“光大华夏”之意。1951年10月，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大夏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学院、南洋模范学校、南洋高级中学、南洋幼稚园等校舍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夏大学名师云集、建筑宏

伟、环境优美，享有“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

这么一座巍峨学府，却毁于日军炮火。1937年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夏大学，“巍峨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

《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一书记载：“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日机首先狂轰滥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前者半毁，后者全毁。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学院在日机的轰炸及炮击下全部或大部分沦为废墟。自8月13日至10月15日止，上海已有14所高等学校被毁或被日军占领。与此同时，被摧毁破坏的还有27所中学、14所小学及8处社教机关，如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体育场、航空协会等等……”